

何谓“历史解释”？

——以“亨佩尔－德雷论战”为讨论中心

顾晓伟

【提要】 “亨佩尔－德雷论战”是历史哲学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历史学中的解释来展开，是战后英语世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争。20世纪40年代，亨佩尔提出科学解释的一般形式，即“覆盖律模式”，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经验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意在寻求现象和事件的原因与规律，两者在方法论上并无不同之处；德雷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往的人类行动，而行动有着不同于事件的自由意志面向，自然科学中的因果性和规律性解释并不能照搬到历史学，进一步提出历史解释中的“合理行动原则”。唐纳德·戴维森在两者之间独辟蹊径，提出历史解释的整体论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历史学中的合理性解释，又辩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关键词】 历史解释 因果关系 覆盖律模式 合理性 异态一元论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是一个争讼不止的古老话题。自近代学科确立以来，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要求对自己的学科性质和内涵进行正名。享有“近代史学之父”声誉的兰克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一书的前言中，就声称要与“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划清界限，史家应该到档案文献中寻找“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其职责是“对事实进行精确地陈述”^①。此后的职业历史学家大多接受了类似兰克申明的家法，却很少去严格论证“历史学何以是如此的”。历史学在经历了19世纪末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人们普遍地期望从认识论的层面去探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客观性问题，而“亨佩尔－德雷论战”最集中体现了二战间及战后英语世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今天，重新回顾亨佩尔与德雷的论争，在更广阔的分析哲学运动中探讨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澄清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一、历史解释中的因果性解释与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现象，常常要对此做出描述（description）和解释

^①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2—224页。

(explanation)。面对众多的繁复现象,哲学上有一个一般原则,认为“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原因”。近代英国大哲学家休谟则要进一步追问道,“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必然的”,也即是“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特定的原因必然有那样特定的结果,我们为什么由这一个推到那一个的推断呢?”^①休谟认为因果关系要求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被认为原因或结果的对象在时空上的接近关系;另一个是,原因(cause)在时间上先于结果(effect)的接续关系,但是,休谟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造物主的天赋观念,而是人类的主观心理联想形成的习惯性联结。这类知识来自于观察和经验,只能得出归纳的概然性知识。^②大阳为什么天天从东方升起也就不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人们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印象中获得的习惯(custom),也就不能必然地推论出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哥白尼通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否证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精确证实了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通过观察和实验这种方式,我们也就对各种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爱因斯坦曾简明地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③

参照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研究的一般原则,两者都分享着一段连续时间的“过程”(process)概念。例如,史家要探究恺撒为什么入侵不列颠,首先,史家要发现相关事件的所见过或所记忆的那些符号和文字,也即是史料和遗迹;再者,史家根据文献学和年代学等辅助学科和科学的程序来检验史料的可信度,以确立事实;最后,史家概括和归纳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依循这一进路,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卡尔·亨佩尔(Carl G. Hempel, 1905—1997)在1942年发表的《普遍定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在历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普遍定律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它们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甚至构成了常被认为是与各门自然科学不同的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基础”。^④普遍定律(general law)是由适当的调查发现(findings)来证实和否证的全称条件形式的陈述(statement),由于“定律”会不断地面对在实际经验中相关证据的挑战,这种普遍定律也始终只能是“普遍形式的假设”。由此,亨佩尔认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解释包括:

(1) 一组断言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 $C_1, \dots, C_n$ 的陈述。

(2) 一组普遍假设, 如此:

{ (a) 这两组陈述都由经验证据充分而合理地确证。
(b) 断言事件 E 发生的语句就能从这两组陈述中逻辑地推演出来。^⑤

① 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5—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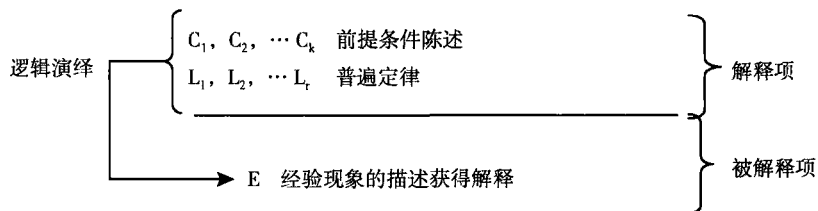
② 参见周晓亮著:《休谟及其人性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③ 爱因斯坦著,徐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④ 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9, No. 2 (Jan. 15, 1942), p. 35, also collected in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Free Press, 1965. 中译参照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232.

所以,对事件 E 的解释就是从解释项 (Explanans) 逻辑推演出被解释项 (Explanandum), 用“图式”(schema) 表示就是^①:



在对一个物理现象的解释中,亨佩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图式,比如,如何描述和解释一辆汽车的水箱经过一个寒冷的夜晚而破裂。(1)的语句可以是下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陈述:车整夜都放在街上。由铁制成的水箱灌满了水,且水箱的盖子是拧紧的。夜间的温度从傍晚的 39°F 下降到早晨的 25°F,气压正常。水箱材料的破裂压力为某一数值。(2)则包括如下一些经验规律:在标准大气压力下,水在 32°F 以下结冰。在 39.2°F 以下,如果体积保持不变或减小,全部水的压力随着温度的下降而增大;当水结冰时,压力再度增大。归根到底,这组陈述必须包括一组有关水压的变化是水的温度和体积的函数的数量规律。所以,从这两组陈述中,就能用逻辑推理推导出水箱在夜间破裂的结论,也就做出了所要考察的事件的解释。以此类推,历史学家在对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同样要满足上述条件,“两者都只有依靠普遍概念才能说明它们的课题,历史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不多也不少,能够‘把握’它的研究对象的‘独特个体性’”。^② 例如,历史学家要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首先,史家要给出(1)组陈述: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宣战;德国入侵苏联;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德国和日本相继无条件投降。这一段连续时间内的陈述要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其次,史家要有(2)组陈述:“大萧条”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沉重打击,法西斯势力崛起;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军事实力发展较快的德、意、日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组陈述中,就包含了经济影响政治的普遍假设,而且确立经济与政治之间函数的数量规律要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史家就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果是,我们不仅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同时也根据普遍假设逻辑推导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就不能再按照上帝的“意志”或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等等目的论进行解释,“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目的在于表明,所研究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鉴于某些先行条件或同时性条件而被预料到的。这种预料不是预言或占卜,而是建立在普遍定律的假设之上的理性的科学的预见”。^③ 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如此严格的限定条件是

① Carl G. Hempel and Paul Oppenheim,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5, No. 2 (Apr., 1948), p. 138.

②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233.

③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235.

无法实现的,在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使史家承认经济与政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也无法形成类似于水在零度就结冰那样的数量规律。亨佩尔也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普遍假设只能是“解释概略”^①(*explanation sketch*),他之所以要提出严格的全称条件,在于“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的主要功能是以通常被称为解释和预见(*Prediction*)的模型把事件联结起来”。^②

在自然科学中,解释与预见具有对称性。解释就意味着预见,能够预见的解释才能称之为科学解释。我们无法想象天文学家会像诗人那样,只是描绘天上的繁星多么壮观,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不把预测行星的运动轨道作为它的首要职责。比如,根据牛顿力学,给定了某一物体的现在的位置和动量,我们就能预测它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的位置和动量,可以对它在过去某一时刻的位置和动量进行测算,同时也可以根据物体过去的状态对于它在现在的位置和动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近代历史学中,史家也常常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自己职责,但是,至今看来,史家从来没有设想过理论物理学那样的工作,成立理论历史学这样一门学科,或者换句话说来说,设想通过制造一台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以此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史家也常常会反驳,历史学虽然对时间和空间感兴趣,但是历史学研究对象是人,是以人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为对象,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学科,历史学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预见,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安放人类的自由意志。可是,我们也看到,近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也都是以人及其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根据普遍假设和数量关系而发展成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所以,在亨佩尔看来,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两者都是一门经验科学,都是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来研究时空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学中的“解释概略由或多或少模糊暗示规律和有关初始条件的部分组成,它需要进一步地‘扩充’以便转变成完全成熟丰满的解释”。^③

二、历史解释中的合理性解释与德雷的“合理行动原则”

作为英美世界重要的历史哲学家,威廉·德雷(William H. Dray, 1921 - 2009)则为自律的历史学进行辩护,与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The Covering Law Model)针锋相对,提出了“合理行动原则”(The rationale of actions)。亨佩尔认为经验科学就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在德雷看来,历史学更多地要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在解释一个事件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对事件为什么不需要必然发生的假设提出反驳,而当我们解释一个事件怎样发生的时候,通过指出进一步的事实,就可以对事件不可能发生的假设提出反驳。所以,“为什么”的问题总是要论证它是必然的,而“怎么样”则是讲述实际发生的故事;而且,回答“怎么样”的问题要先于“为什么”的问题。^④例如,解说员在解说一场足球赛,首先介绍红蓝两队出场的队员,球员开球,比赛开始了,

①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238.

②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232.

③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237 - 239.

④ William Dray, "Explanatory Narrative in Histor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4, No. 14 (Jan., 1954), pp. 15 - 27.

紧接着,后卫拦截了一次进攻,迅速把球传给中卫,中卫巧妙地盘球过了几个后卫,迅速地传给前锋,前锋接到传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向球门,球进了,红队领先,……时间到了,最终红队 2:0 胜利。在这一系列的解说过程中,解说员并不需要解释一位球员为什么把球传给了另一位球员,也不需要根据牛顿力学的定律去预见球踢出后会不会进球门。在这一复杂的情境中,球员时时刻刻面对着偶然发生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判断做出选择。况且,足球的最大魅力也恰好来自人们很难做出预测,所以,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并不总是因果的必然联结,而是通过可理解的方式或然联结在一起的,解说员和观众也能够依靠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常识达成和谐一致,理解球场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与此类似,我们随意翻开一本历史学著作的目录,都会看到大致可理解的有着开端和结尾的连续时间序列,如果再打开一本物理学著作与之对比,情况就会大为不同。这是因为历史学主要是以人类在社会中活动为研究对象,它们往往来自日常生活经验,人们阅读历史著作也主要是想从中扩展自己的经验,这的确与物理学纯粹研究自然现象有着重大的差别。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学中的解释到底遵守什么样的特殊模式呢?

在 1957 年出版的《历史学中的规律与解释》一书中,德雷对覆盖律模式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在覆盖律作为必要条件方面,德雷认为历史学家解释的事件是唯一的事件,是不会重复的事件,这不同于逻辑学家所说的事件,“历史学家的解释,特别当他描述细节时,他对一个情境(situation)和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描述是唯一的”。^① 比如说,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布鲁塔斯在罗马元老院刺死了

看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术语,而且是一个严格且窄化的语词,所以覆盖律就不能作为历史学家解释的充分条件。

在德雷看来,历史学家对解释的使用中包含更广阔的“实用主义面向”^①(pragmatic dimension),历史著作中出现的“因为”(causes)更多的是一个可理解的、合乎理性的“理由”(reasons),基于这种考虑,德雷提出了“合理行动原则”。自然事件可以在经验规律中获得解释,而历史学家要解释的则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有重大意义的个体的行动”。覆盖律模式在这里是派不上用场的,这通常来自这一信念:“人类的行动(human actions)——至少我们称之为‘自由’——是无论如何不能归之为规律的。”^②历史学家要想获得解释,不仅要像覆盖律模式那样得到外部的解释,而且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强加给自己的本然任务,就是从内部理解人类的行动,“史家必须穿透到现象的后面,洞察到情境,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想象地投射进对象的情境之中。他必须重新复活、重新设定、重新思考、重新经验这些他试图理解的希望、恐惧、计划、欲望、观点、意图等等”。^③所以,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就包含两个层面,外部经验事实的因果解释和内部意识的合理解释,考虑到人类行动的自由意志,合理解释是不能还原到或替换为因果解释的。“当我们要寻求一个行动的解释,我们经常需要的是,重新构造出基于特定环境中行为人自己估算的手段去适应他选择的目的。解释一个行动,我们需要知道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使得行为人确信他需要像他过去所作的那样而行动。”^④在一种情境下,类型 $C_1 \cdots C_n$ 的事情为 x ,当我们说 A 做了 x 是因为 y ,这里的 y 是 A 做 x 的理由。我们还会说,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们知道事实 y ,而且也知道 A 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也即是不会惊讶 A 做了 x 。因此,德雷认为,比之于覆盖律模式中“隐含的规律”(implicit law),我们应称之为“行动原则”(principle of action)更好。^⑤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德雷对覆盖律模式的反驳主要是基于人类行动中的主体意识(self-conscious)不能够还原为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也不必还原到心理学意义上的脑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更好的态度应是日常语言使用中的实用主义,这也更符合大多数历史学家实际工作中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德雷在反驳亨佩尔的论述中所依据的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参照英国观念论者柯林武德、奥克肖特的论述并为之辩护;另一方面是汲取分析哲学中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而这些恰好是亨佩尔激烈反对的,“19世纪末,史学界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论点是:历史学的性质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因而二者的解释方式也不同。沿着这个路数推论下去,就走入了二元论,把统一的世界分裂成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⑥亨佩尔提出的科学一元论就是要解决二元论所带来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分裂局面,始终认为科学解释的逻辑是普遍有效的一般形式。

亨佩尔承认德雷辩护的“移情理解法”(the method of empathic understanding)是历史学家经常运

① William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p. 73 - 75.

② William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 118.

③ William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 119.

④ William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 122.

⑤ William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p. 132 - 133.

⑥ 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用的方法,但却认为它本身并不构成解释,说它是一种启发性的手段更为合适,经常是依靠“说服性的隐喻”(persuasive metaphors)得到的,“在历史学中,与经验科学的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对一个现象的解释在于把现象纳入到普遍经验规律之下,解释的可靠性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诉诸于我们的想象,并不在于它是根据有启发性的类比提出来的,或是使它显得似乎真实的其他方法——这一切在假的解释中可以存在——而唯一在于它是否依靠有关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的被经验完全证实的假设”。^① 针对德雷提出的“合理行动模式”,亨佩尔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严格蕴涵的“演绎—法则模式”(the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提出“归纳—统计模式”(the 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和“演绎—统计模式”(the Deductive-statistical Model)作为补充。

不过,亨佩尔也针对德雷提出了反驳,认为提供一个事件的经验证据与解释一个事件是不同的。再者,提供 A 做了 x 是合理的理由并不能使得我们确信 A 事实上做了 x,如果要证成后一个信念,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假设:A 是理性的行为人和以此来确证在特定环境中行为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合乎理性的。加上这个假设之后,行动的原则就可以还原到或替换为描述性的概括(descriptive generalization),这又可以恢复到解释的覆盖律模式,用图式来表达就是:(图式 R)^②

A 处于类型 C 的一个情境中

A 是理性的行为人

在类型 C 的一个情境中任何理性的行为人都都会做 x

所以 A 做了 x

德雷与亨佩尔的这场论争激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他们对“历史解释”的分析在英美世界掀起了极大的反响,英国《心灵》(Mind)杂志和稍后在美国 1960 年创办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讨论和论争。可以说,国际知名刊物《历史与理论》杂志就是在这场争论的直接刺激下于 1960 年创办的,也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此后一段时间英美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可能趋向。帕特里克·加登纳、莫顿·怀特、阿瑟·丹图、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等历史哲学家倾向于亨佩尔的科学解释^③,而沃尔什、艾伦·多纳根、加利、路易斯·明克等历史哲学家更多地站在德雷的立场为历史学作为一门自律的学科辩护^④。如果我们从历史哲学接下来的发展脉络来看,争论双方都不同程度上吸收和调和了对方的观点,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他们的不同

① 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pp. 239 - 240.

② Carl G. Hempel, "Rational Actio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35 (1961 - 1962), 3. 1, pp. 11 - 13.

③ 帕特里克·加登纳著:《历史解释的性质》(Patrick L.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莫顿·怀特著:《历史知识的基础》(Morton White,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arper & Row, 1965);阿瑟·丹图著:《分析的历史哲学》(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莫里斯·曼德尔鲍姆著:《历史知识的剖析》(Maurice Mandelbaum, *The Anatom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加利:《哲学与历史理解》(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hatto and Windus, 1964);路易斯·明克:《历史理解》(Louis O.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ited by, Brian Fay, Eugene O.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之处。^① 他们把历史哲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解释”上面,也更多体现出他们都认同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首要性。自1973年《元史学》出版以来,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家打破了这一调和状态,重新把历史学中的先验问题摆在了历史哲学的聚焦之处,“历史叙述”的问题成为历史哲学的首要性问题。

三、历史解释的整体论与戴维森的解决方案

亨佩尔与德雷的论战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讨论,也同样基于他们的论战涉及人类文明在不同时代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形而上学表现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问题,在哲学史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问题。

亨佩尔是维也纳学圈的重要成员,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覆盖律模式”是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新的表现形式。这也使得我们看到,亨佩尔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统一化立场并不是在真空中构造出来的,而是与20世纪初英美世界广泛的分析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倾向于以自然科学和数理逻辑为标准,重新改造人类的一切知识。^② 分析哲学的开创者罗素就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黑格尔及其门徒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扩大了逻辑的范围”是错误的,只有数理逻辑才是真正的哲学逻辑。^③ 艾耶尔也要返回到休谟的立场,把一切真正的命题分为两类:逻辑和纯粹数学的分析命题和有关事实的经验可证实的命题。“一个句子,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④ 以此标准,那些断言非经验的价值世界,人有不死的灵魂,或者有一个超验的上帝都是神秘主义的,没有意义的。赖尔也激烈批判了欧洲大陆笛卡儿以来的心灵和身体两个实体的二元论,斥之为“官方的神话”、“机器中的幽灵”,他们认为在具有物理属性的身体中存在着不同属性的心灵,把心灵等同于私密的、默不出声的或内在的“场所”,而这种二元论是一种范畴错误,赖尔提出应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研究人的行动。^⑤

波普尔早在30年代发表的《研究逻辑》^⑥一书中就提出了类似于亨佩尔的演绎模型,人们后来也合称为“波普尔—亨佩尔理论”(Popper-Hempel Theory)^⑦。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方法论层面,历史主义反对自然主义,认为历史学是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在历史观层面,历史主义拥护自然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客观的历史规律。波普尔则是把历史主义的两个方面完全颠倒了过来,认为历史学在方法论上

① Howard Adelman, "Rational Explanation Reconsidered: Case Studies and the Hempel-Dray Model,"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3, No. 3 (Oct., 1974), pp. 208 - 224.

② 参见鲁道夫·哈勒著,韩林合译:《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 罗素著,陈启伟译:《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5页。

④ 艾耶尔著,尹大贻译:《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2页。

⑤ 赖尔著,徐大建译:《心的概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49,400—414页。

⑥ 参见波珀(即波普尔)著,查汝强、邱仁宗译:《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 Alan Donag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The Popper-Hempel Theory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 No. 1. (1964), pp. 3 - 26.

并没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方法；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意义的决定过去和未来的客观规律，并不存在有着整体发展目的那样的“空想工程学”，只能有经验上不断试错的“零碎工程学”。^①

波普尔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与亨佩尔稍有不同，但考虑到西方二战前后的历史实际，他们都不避免地把矛头对准了盛行于德国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在认识论上把自然和历史分成两橛的历史哲学。^② 这场非常时刻的哲学运动为英美世界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得他们激烈地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脉络。具体到史学史领域，战后慢慢形成的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都不同程度从传统的观念史或政治史过渡到了新的社会史、制度史，采用了大量的数量分析和解释架构，也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波普尔—亨佩尔理论”。^③

如果我们参照后分析哲学的发展脉络，“历史解释”的问题就可以在不同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另一条进路中获得解决。首先，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早期的语言与实在——对应的图像论，提出语言的意义即使用的实用主义观点，为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对日常语言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提供动力支持。德雷的合理性解释也即是在日常语言的层面对历史学自主性的辩护。1951年，蒯因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抓住了现代经验论的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一为分析与综合的划界；二为还原论。而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就分享着经验论的还原论教条，“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之间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④ 亨佩尔坚守的还原论立场是基于解释与预见的对称性和同构性，否则的话，解释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必然的解释。而德雷的合理行动原则则是在非还原论的立场辩护人类行动的自由意志，由此，亨佩尔与德雷的论战就演化成了一场古老的形而上学的争论，也就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争论。

再者，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在科学哲学内部也遭受了批判，亨佩尔只是给出了科学解释的一般形式，但忽略了科学解释的内容，适合于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忽视了作为解释前提的普遍定律的发现，只能适合于已完成的科学。这不仅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科学史的实际情况。^⑤ 例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的时候，人们对牛顿的运动理论并不是用万有引力定律来理解的，而是把它看成纯粹数学的理论，莱布尼茨从不认为这个理论是令人满意的物理解释。科学解释成为普遍认可的普遍定律也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且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也会发生不同层面的争论，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也与另一位物理学家玻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的这场理论物理学内部的争论也没有最终的答案。托马斯·库恩就此提出科学解释的历史主义理论，一种基于社会认识的“范式”(paradigm)理

① 参照波普尔著，何林等译：《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附录部分，第412—179页。

② 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回应相对主义》(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38)

③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332页。

④ 威拉德·蒯因著，江天骥等译：《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⑤ 陈嘉明等著：《科学解释和人文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105页。

论,“科学的历史可以桥接科学哲学与科学本身之间的鸿沟,可以成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的源泉”。同时“在历史学中正是这种模糊的综合关系才真正负担起了连接各种事实的全部重担。如果历史学是解释性的,那不是因为历史叙事为一般规律所覆盖”。^①

既然人类行动中的合理性解释不可还原到自然科学的因果性解释,那么两者处于怎样的关系? 1963年,戴维森发表《行动、理由和原因》一文,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一般认为,人的行动是自由的,我可以在教室里自由地走过去,也可以自由地走回来,完全依靠我的意向和欲望。戴维森认为,要对这些基于意向和意愿而做出的行动给出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就必须有一个理性动物的假设,“行动总是以与当事人的某种长期或短期的、独有或非独有的特征相融贯的形式显现出来,而那个当事人则以理性动物的角色出现”。^② 所以,这些意向和愿望总是要通过身体的运动来实现。如果我说我在心里自由地想象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就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区分究竟是意愿还是幻觉之类的心理感受。维特根斯坦曾举过一个例子,当“我举起我的手臂”时,是我的手臂上去了。如果从我举起我的手臂这一事实中抽掉了我的手臂往上去了这一事实,那留下的是什么呢? 这些运动感觉就是我的意愿吗?^③ 所以,戴维森坚持一种自然主义的、外在主义的标准,赞同亨佩尔的科理解释,认为合理性解释一类因果性解释,“行动的基本理由即是它的原因”,“合理化解释是一类因果解释”。^④

但是,戴维森没有像亨佩尔那样把合理性解释还原到或替换为因果解释,在1970年发表的《心理事件》一文中,他提出了异态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试图在形而上学的层面解决身心二元论,主旨是:(1)所有心理事件都与物理事件有因果关系,一切事件都是物理的;(2)作为原因和结果而联系在一起的事件都纳入决定论的严格规律,哪里有因果关系,哪里就有规律;(3)不存在能据以预言心理事件和对之做出说明的决定论的严格定律,不存在把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联系起来的严格的心理—物理定律。^⑤ 所以,戴维森对“历史解释”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独特的,既不同于亨佩尔的因果性解释,又不同于德雷的合理性解释,而是把两者包含在一起的整体论(Holism)。在1982年发表的《理性动物》一文中,戴维森提出“三角架构”(triangulation)的隐喻来说明历史解释的整体论,“我们的客观性概念是另一类三角架构的结果,它要求两个生物。其中每一个生物都与一个对象相互作用,只有通过语言在生物之间建立起的基本联系,才能给每一个生物以事物客观存在方式的概念。事实上,只有他们共享一个真概念,才能使下述判断有意义:他们有信念,他们能够在公共世界中为对象安排一个位置”。^⑥ 用图形表示就是:

① Thomas S. Kuh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Essential Tens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3 -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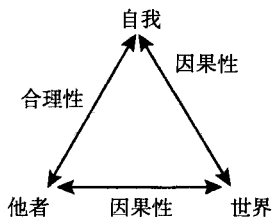
② Donald Davidson,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

③ 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I—621, 第224页。

④ Donald Davidson,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pp. 3 - 4.

⑤ Donald Davidson, "Mental Events," 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07 - 225. 另参照张志林:《分析哲学中的意向性问题》,载《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7页。

⑥ Donald Davidson, "Rational Animals" i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5.



在上述的三角架构中,有着两类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构成了合理性解释;另一个是交往着的人们与世界的共同因果关系,构成了因果性解释。在一个历史解释的整体论脉络中,并不存在合理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何者优先的问题,而是两者处于共在的三角架构中。戴维森提出的异态一元论有效地解决了“亨佩尔-德雷论战”的二元对立,既辩护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基础性地位,又承认了历史学作为一门自律的科学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解决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面临的客观性问题的挑战。诚如何兆武先生所言,“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①

(作者顾晓伟,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邮编:100084)

(责任编辑:于沛)

(责任校对:景德祥)

^①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清华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3—4页。

SUMMARY OF ARTICL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Hu Fengxiang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both a thought weapon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a revolutionary theory to remold the present society.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from early last century, it had produced broa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its tenacious vitality and its own scientificity. Naturally, due to the discrepancy in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this theory, different levels and schools had formed in practice, thus increasing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is era, at least two aspects should be addressed: first, the growth and activities of the camp of Marxist historian, and seco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each subarea of historiography. The former constitutes the core and major power of Marxist historical science of China, and the later indicates the actual influence in the circle.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as well.

On the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Dimension of Ankersmit // *Wang Lihong*

Ankersm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theorist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of historical theory, h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which achieves a shift from language to experience. Even though it has some argumentations on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e ushers a new study 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a new dimension, opens up a new growth point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It reflects the new developing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from a unique side, which being worth to be affirmed.

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Hempel-Dray Debate" // *Gu Xiaowei*

"Hempel-Dray Debate"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 core they debate was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 namely what kind of explanation was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the 1940s, Hempel put forward a general form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Covering Law Model". He argued, as an empirical science to research the past, historiography was as same as natural science to

pursue the reason and law under the appearances and events, nothing different between them on methodology. Against Hempel's theory, Dray who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Rationale of Actions" thought that the object of history to research was human past action which had a dimension of free will of human and c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the law and causality of natural sci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Donald Davison proposes a holistic program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n the basis of schema of "Anomalous Monism" and "Triangulation". His propose effectively solv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above, satisfied th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 and defended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as well.

The Meaning of Recounting: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Value of Historian Absence // Zhang Xiao-xiao

When writing history,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are normally stressed. But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history is contradicted with the limit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undergo and witnes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y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 recounting of historians absence after the historical event happened constituted the mainstream of narrative, and no doubt should be as cutting point when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process of historians writing history is a one to recounting, and the finished work is the result of this process.

On the Thought of Islamic Democracy of Soroush // Ha Quanan Li Han

Sorous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hose thought of Islamic democracy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oriental rationalism, and heavily influenced by liberalism philosophy of west as well. He questions the religious legitimacy of the velayat-e faqih through distinguishing the religion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fights against theocracy extending to the field of secular politics. He asserts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secularism, and pursues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ompatible of Islamic with democracy from outside the field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He believes that democracy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reedom of belief, Islam is the best moral fortress of democracy. The special model of Islamic democracy with both reason and revelation which he built, denies the dichotomy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for Iran, even the whole Islamic world.

Th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 Li Youdong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One is on the binary argument, mainly looking at issues from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al values, arguing that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have total different nature, and thus determines the west taking the lead in